

The collaborative wisdom of Zhe Dong Primary Schoo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teaching alliances”

Jiazhong Wang

Ningbo Colleg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ingbo, Zhejiang, 315300,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e eastern Zhejiang region, with Ningbo at its core, historically formed a three-in-one and functionally complementar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 of “family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official educa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n outstanding mode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logic, cultural gene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eastern Zhejiang, and analyze its collaborative wisdom in terms of “common goals,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and resource inter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edicaments such as ambiguous responsibilities, absence of communities, and weakened link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me-school-community education alliance”, an attempt is made to draw nourishment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astern Zhejiang, and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family learning”, activating the community hub of “community learn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guidance of “official learning” are proposed.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building a moder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Ningbo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charm.

Keywords

Eastern Zhejiang’s Primary Education; Community Schools;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eachers’

浙东蒙学的协同智慧及其对当代“教联体”建设的启示

王家忠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浙江 宁波 315300

摘要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宁波为核心的浙东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家学、社学、官学”三位一体、功能互补的童蒙教育体系,堪称中国古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卓越典范。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浙东蒙学协同体系的历史逻辑、文化基因与运行机制,剖析其在“目标同向、功能互补、资源互通”上的协同智慧。进而,面对当前“家校社教联体”建设中存在的责任模糊、社区缺位、联动虚化等现实困境,试图从浙东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提出强化“家学”伦理根基、激活“社学”社区枢纽、优化“官学”制度引领等实践路径,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神韵的现代协同育人“宁波模式”提供历史镜鉴与创新方案。

关键词

浙东蒙学; 社学; 家校社协同; 教联体

1 引言

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如何凝聚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构建高效协同的育人共同体,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层议题。

【课题项目】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第六轮基础教育研究基地项目“浙东童蒙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JD6-116)。

【作者简介】王家忠(1968-),男,中国浙江宁波人,本科,教授,从事学校管理研究。

题与紧迫挑战。2024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标志着我国协同育人工作从理念倡导迈向制度化、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教联体”被定义为“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的工作方式,其核心在于超越简单的活动叠加,实现机制、资源和文化的深度“融合”。

任何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都离不开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浙东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不仅孕育了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浙东学

派,其历史上自然演化而成的童蒙教育体系——家学、社学、官学三者并立且协同运作的格局——更是中国古代社会探索“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与智慧结晶。这一体系绵延千年,深刻塑造了浙东的人文风貌与社会结构,其内在的协同逻辑与文化基因,对于破解当前“教联体”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学校孤岛、家庭焦虑、社区旁观”等现实困境,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价值。

本文立足于浙东丰厚的历史文脉,旨在深入剖析其蒙学教育中“家学—社学—官学”三位一体的协同逻辑与运行机制,并将其置于当代“教联体”建设的政策语境与现实需求中进行审视。通过这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我们力图从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可资借鉴的协同智慧,为宁波乃至全国高质量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探索一条既遵循教育规律、又彰显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1]

2 浙东童蒙教育“家学—社学—官学”的协同逻辑

浙东的童蒙教育并非单一形态的线性演进,而是一个由家学、社学、官学构成的、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同体系。三者并非彼此取代,而是在“明人伦”的共同目标下,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资源互通,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且富有弹性的育人生态系统。

2.1 基于“目标同向”的角色互补关系

协同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各方主体拥有高度一致的核心目标。在浙东蒙学体系中,家学、社学、官学虽形式各异,但均指向同一个根本宗旨:培养深明人伦义理、品行端方、有益于家国的“君子”或“健全之人”。[2]

家学:伦理奠基与人格养成的“初心”场域^{**}。家庭是人生第一课堂,家学的核心功能在于“蒙以养正”。它并非以系统的知识传授为主,而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父母的身教言传、家族规范的潜移默化,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核心伦理价值,如春雨润物般内化于儿童心性之中。明代大儒、余姚人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这精准概括了家学的首要职责。浙东望族如鄞县全氏、万氏,皆以严谨的家训、族规闻名,其家学教育不仅关注读书识字,更重视在洒扫应对、人情往来中磨炼子弟的品性,为其一生打下坚实的人格“底色”。[3]

社学:社区教化与资源整合的“枢纽”平台^{**}。社学是连接家庭与更广大社会的桥梁。它由官方倡导、地方绅民集资兴办,面向社区子弟,承担着文化普及与社会教化的双重功能。社学超越了单一家庭的局限,将儿童置于社区公共生活之中。其教学内容除了基础读写,常与乡土知识、实用技能(如算账、书信)及地方先贤故事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社学往往与乡约、祠堂、乡饮酒礼等社区活动空间与仪式紧密结合,成为宣讲法令、调解纠纷、举行礼仪、凝聚乡谊的

公共场域。在这里,儿童开始学习社会交往的规则,体会共同体生活的责任,实现从“私德”向“公德”的过渡。

官学:制度规范与价值引领的“导向”体系^{**}。府学、县学等官学体系,代表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制度性存在。它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选拔机制,为社会树立了权威的人才标准与价值标杆,从而无形中规约和引领着家学与社学的教育方向。官学为社学、家塾中的优秀学子提供了制度化的上升通道,实现了人才的纵向流动。同时,浙东学人如黄宗羲更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赋予学校评议时政、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体现了官学体系在价值引领上的自觉追求。

三者之间,家学奠定伦理“初心”,社学拓展社会“实践”,官学确立价值“导向”,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的渐进式育人链条,目标的高度同向性确保了育人合力的形成。

2.2 基于“明人伦”共识的情、理、行贯通体系

“明人伦”是儒家教育的核心,也是串联浙东蒙学三个层次的文化基因。这一共识具体化为“情、理、行”相互贯通的育人实践。[4]

以“情”奠基:家学充分利用血缘亲情这一天然纽带,在充满关爱与信任的环境中实施教化,使伦理规范不是冰冷的外在约束,而是源自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王阳明强调“顺导性情”,正是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情感与心理特点,在“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中实现教化。

以“行”为径:社学提供了将伦理认知转化为社会行为的实践场域。习礼、参与乡约、服务社区,都是在具体的行动中体会“人伦”的真谛。这正是“知行合一”哲学在教育中的体现——真知必在于行,德行必显于事。

以“理”升华:官学通过系统的经典研读与义理辨析,将基于情感和实践的伦理体悟,上升为理性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念,明确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道义担当。

由此,“情、理、行”在家学、社学、官学中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品德养成体系,避免了道德教育沦为空洞说教。

2.3 基于“制度衔接”的官、绅、民协同可持续生态

浙东蒙学协同体系的长期维系,依赖于一个官、绅、民多方力量参与、资源良性循环的开放性生态系统。

乡贤反哺:地方士绅、致仕官员在获取功名或积累财富后,往往秉持“反哺桑梓”的传统,捐资兴办或修缮社学、义塾,设立学田,成为基层教育重要的资源供给者。他们也将更高的学识视野带入地方教育。

社学荐才:社学作为基层教育枢纽,承担着发现和选拔优秀童生的功能,向官学输送生员,打通了人才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官学上升与反馈:官学体系不仅接纳地方人才,其学风、政令也通过士子、官员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教育风气。学有所成或致仕返乡的士人,又常常成为家学导师或社学主持,形

成文化资源的反向流动。[5]

这一“官倡民办、绅为纽带、民得教化”的生态，构建了一个相对可持续的教育供给与人才循环模式，使得协同育人不仅仅是理念，更是一种深深嵌入地方社会结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实践传统。

3 当代“教联体”建设的政策诉求与协同困境

国家层面推动“教联体”建设，是对新时代育人格局的战略重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然而，理想图景与落地实践之间，仍存在诸多亟待弥合的缝隙。

3.1 政策演进：从“协同育人”到“教联体”的制度化探索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协同育人进入了新阶段。其核心要义在于：

目标具体化：明确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共同目标，超越单一学业成绩取向。机制系统化：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各方职责，特别是强调了政府的统筹作用和学校的主导地位。载体实体化：提出建设“教联体”这一具体工作方式，强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推动协同落地。进程指标化：设定了2025年50%的县建立、2027年全面建立“教联体”的时间表与任务目标。

这一系列设计，旨在将长期以来较为松散、随机的家校社合作，升级为有规划、有组织、有保障的制度化协同体系。

3.2 共识模糊：当前协同育人实践中的主要困境

尽管政策导向明确，但在实践层面，“教联体”建设仍面临深层次挑战，其根源在于协同的“共识”未能真正建立，系统处于“弱连接”状态。

责任边界模糊与联动机制虚化：家庭、学校、社会三方权责在实践中常常混淆。“学校主导”易异化为“学校主责”，家庭与社会将育人责任过度推给学校；而学校期望家庭与社会配合时，又因缺乏有效的权责界定和激励机制，导致配合度不一。联动多依赖于临时性活动（如家长会、开放日），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协调平台与争议解决机制。

社区教育功能弱化与资源整合不足：与现代城市社区相比，传统“社学”所依托的紧密共同体关系已然淡化。社区在教育中大多处于“资源提供场地”或“活动配合者”的被动角色，其主动的教化功能、文化凝聚功能严重萎缩。同时，散布在社区内的各类文化场馆、企业、非遗传承点等社会教育资源，处于“沉睡”或“碎片化”状态，未能通过有效机制与学校教育体系有机整合。

学校主导力与家庭、社会参与度之间的张力：学校在学习上占主导，但面对多元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其主导力常常受限。家庭教育理念的差异（如“鸡娃”与“放养”）、社会功利思潮的冲击，时常消解学校的教育努力。

学校在开放校园、引入社会资源时，也面临安全、管理、课程融合等多重压力，存在“不想联、不敢联、不会联”的困境。

3.3 历史参照：传统社学社会功能的失落与再造可能

对比浙东传统社学的三大社会功能，当代社区在协同育人中的缺位显得尤为突出：

“化民成俗”的道德教化功能**：现代社区较少有意识地承担共同价值观培育的使命，公共精神生活匮乏。

“敦睦乡里”的社会整合功能：社区邻里关系疏离，缺乏将儿童与家庭凝聚起来的公共文化活动和仪式。

“辅助治理”的秩序维系功能：社区在教育治理中角色边缘化，未能成为预防和化解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前沿阵地。

因此，当代“教联体”建设的关键一环，在于重新发现并激活社区的“社学”功能，使其从一个地理空间，转变为一个富有教育意涵的文化与生活共同体。这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借鉴其“枢纽”地位与“融合”智慧，进行现代性再造。

4 浙东蒙学协同智慧对当代“教联体”建设的启示

历史的智慧不在于复制具体形式，而在于启迪系统思维与创新路径。浙东蒙学“三位一体”的协同智慧，为破解当代困境、构建高质量“教联体”提供了深刻启示。

4.1 强化“家学”根基 推动家庭教育回归“蒙以养正”的本源

当前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重智轻德、方法焦虑、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浙东家学传统启示我们，家庭的 core competence 在于伦理奠基与健康人格的培育。

建议一：系统化开发地方家训文化资源，建立新时代“家学”教材体系**。由教育、文旅、妇联等部门协同，组织专家系统挖掘整理宁波历史上著名家训（如《王阳明家训》《黄宗羲家训》及甬上望族家规），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编撰成《宁波优秀家训现代读本系列》（分幼儿、小学、中学家长版）。将其纳入各级家长学校核心课程，让传统智慧为现代父母提供处理亲子关系、培养子女品德的参照。

建议二：推广“阳明心学”亲子教育理念，赋能家长科学育儿能力**。开设“阳明家教工作坊”和线上课程，向家长普及“顺应性情”“鼓舞兴趣”“事上磨练”等心学教育思想。引导家长将教育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共同劳动、自然探索、克服困难等“事上”体验，培养孩子的责任感、韧性与独立人格，缓解育儿焦虑，建立亲密而有益的亲子关系。

4.2 激活“社学”功能：推动社区从“物理空间”到“育人共同体”转型。

必须彻底改变社区在育人中的被动角色，借鉴传统社学作为公共枢纽的经验，使其成为联结学校与家庭、整合社

会资源、滋养儿童社会性的活性平台。

建议一：推动社区公共空间“社学化”功能升级。明确将遍布城乡的“文化礼堂”“社区邻里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定位为“现代社区学堂”。不仅提供活动场地，更应系统规划，常态化开设“四点半课堂”、周末非遗工坊、乡土历史讲座、儿童议事厅、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等，使其成为儿童课后与假期的核心活动场所。

建议二：构建“社区教育导师库”与“乡贤智库”。广泛登记和吸纳社区内退休教师、干部、科技工作者、艺术家、工匠、企业家、优秀家长等人才，形成结构化的“社区教育导师库”。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他们根据专长开设微课程、带领项目小组、担任生涯导师。这既是盘活本地人力资源，也是让儿童在真实的社会角色模范中学习。

建议三：深度融入地方文化，开发“行走的乡土课程”。与学校合作，共同设计开发以社区为课堂的探究性学习项目。例如，围绕“老宁波的街巷故事”“母亲河的生态调查”“社区商业形态探秘”“寻找身边的非遗”等主题，组织学生在社区内进行访谈、观察、记录、实践。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区展览、表演或政策建议，让学习成果服务社区，增强儿童的主人翁意识与文化归属感。

4.3 优化“官学”引领：强化学校在协同中的“主导”与“纽带”作用

学校作为专业化教育机构，应在“教联体”中承担起设计者、协调者和专业引领者的关键角色。

建议一：加强区域顶层设计，出台《“教联体”建设实施指南》。宁波市可借鉴历史“官倡”经验，研究制定具体化的地方实施细则。明确县（市）区、街道、学校各级在“教联体”中的具体职责、协作流程、经费保障、人员配置及考核评价办法，为基层实践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施工图”。

建议二：开发“浙东文化”融合课程，打开学校课程边界。鼓励学校将浙东学术思想（如王阳明“知行合一”、黄宗羲“天下为公”）、地方历史、商帮文化、海洋精神等元素，创造性转化为校本课程或学科融合项目。在这些课程的实施中，强制性要求引入家庭与社区资源：邀请家长讲师、社区导师进课堂，将学习场景延伸到博物馆、企业、田间地头。使地方文化成为协同育人最自然、最坚实的纽带。

建议三：建设数字化“教联体”云平台，赋能教师新角色。开发区域统一的协同育人管理服务平台，集成资源发布、课程预约、活动报名、成果展示、在线沟通、数据记

录等功能。****** 特别要赋能班主任和骨干教师，通过培训使其成为“协同育人协调师”，负责定期组织班级层面的家校社联席会议，策划个性化协同教育活动，并对学生成长进行多方记录与综合评价。将教师从单纯的学科教学者，部分转型为育人共同体的组织者和促进者。

5 结语

浙东大地“家学—社学—官学”绵延千年的教育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一方水土的文明教化与人才辈出，从来不是家庭、学校或官府任何单一力量的功绩，而是多方在共同文化目标引领下，各安其位、各展其长、相互滋养的协同结果。其蕴含的“目标同向的凝聚力、功能互补的系统观、资源互通的生态思维”，是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直抵教育本真的宝贵智慧。

今天，站在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与“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新起点的宁波，肩负着为全国教育改革探索路径的使命。当国家“教联体”建设的号角吹响，宁波最具优势的，恰恰是脚下这片土地积淀的深厚协同育人文化基因。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怀旧的模仿，而是自信的“承古开新”——将浙东蒙学协同智慧的精髓，与当代儿童发展规律、现代教育治理手段、数字化技术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

通过强化家庭“蒙以养正”的伦理根基，激活社区“化成俗”的公共枢纽功能，优化学校“制度引领与专业纽带”的主导作用，宁波完全有能力率先构建起一个政府有力统筹、部门高效协作、学校专业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积极参与的，既符合普遍规律、又充满地域神韵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这不仅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宁波答卷”，更将是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贡献的、源自悠久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宁波智慧”与“宁波模式”。让历史的智慧，真正照亮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的未来之路。

参考文献

- [1] 施克灿.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J].教育学报,2013,9(06):112-117.
- [2] 刘和富,谭含金.“阳明社学”与明清赣南乡村教育研究[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5,46(01):46-50.
- [3] 李菲,易桃.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美国服务学习的思考[J].中小学德育,2023,(11):8-12.
- [4] 孙文文.明代教育治理思想及实践研究[D].河南大学,2024.
- [5]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